

DOI: 10.13288/j.11-2166/r.2015.24.024

收藏中医

——早期《北京中医》《中医杂志》报国寺发现回家记

周 宏¹, 张红林²

(1. 北京市西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07 号, 100033; 2.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09 年 3 月的一天, 我们在逛报国寺收藏品市场时, 发现在西配殿南侧靠墙的书摊上有一摞约半米高的发黄杂志, 用粉红色的塑料绳捆着, 最上面一本用透明玻璃纸套着, 可以看到“《北京中医》第一卷第一期,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五日”的字样, 从收藏的角度看, 一般创刊号都是比较珍贵的, 因此引起了我的注意。上前随便翻了一下, 下面是《中医杂志》, 从 1956 年至 1959 年的, 序号较全。因笔者与《中医杂志》副总编是大学同学, 就给她打电话询问有关情况。得知早期的《中医杂志》实物已缺藏, 同时了解到《中医杂志》的前身就是《北京中医》。闻听此言, 我觉得这些刊物具有珍贵的史料和学术价值, 我一边应答着同学的电话, 一边跟摊主询价, 最后花 500 元买下了这一摞杂志。回家打开一看, 共 81 册杂志, 其中《北京中医》和《中医杂志》有 1951 年 1 册、1953 年 1 册、1954 年 4 册、1955 年 2 册、1956 年 12 册、1957 年 12 册、1958 年 10 册、1959 年 19 册、1960 年 1 册、1965 年 10 册, 以及医药结合资料等其他医学刊物。

1 这些珍贵资料的保存者或许是王水先生及其家人

在《北京中医》1954 年 5 月号、6 月号、11 月号、12 月号的封面上, 均盖有红色的“赠阅”印章, 依照以往的惯例, 发表文章的作者是要送一本杂志赠阅的。又翻看杂志中《本刊投稿规则》中, 有来稿刊登后“赠送本期刊物一册, 酌送稿酬”的说明, 而作者姓名在这 4 册杂志中都出现名字的, 只有“王水”先生一人, 依此我推测这套资料的原主人为王水先生和他的家人的可能性较大。查找王水先生的履历、经历不可考, 网络上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但是从他的连载“常用中药”可以看出, 王水先生应是当时的一位比较有学术造诣的中医学者。无论如何, 这些期刊杂志能够保存 60 多年, 能够保留新中国中医发展的珍贵历史信息, 这些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感

谢王水先生及其家人, 也感谢把这些资料搜集起来带给我们的摊主。

2 藏品中的几个信息

1) 北京中医学会成立的准确时间为 1950 年 5 月 30 日。《北京中医》第一卷第二期中, 《通报·秘字第一号》《北京中医学会成立一周年工作收获之我见》《北京中医学会组织系统表》等文章, 详尽记载了北京中医学会成立的时间、经过、组织机构、人员、分工等重要史实, 为研究北京中医学会的早期历史提供了准确、详细、权威的文献资料。

2) 北京中医学会的地址的变迁。1951 年在“北京内一区八面槽 23 号”, 1953 年至 1954 年 12 月在“北京西四北大街路东 31 号”。《北京中医》第 1 卷第 2 期的封三上记载着北京中医学会的地址在八面槽 23 号。过去从东安市场往北延至灯市西口一带称为八面槽大街。1953 年第 8 期的封底写有“本市零售处: 北京西四北大街路东 31 号北京中医学会”; 1955 年改成《中医杂志》后, 地址仍在北京西四北大街 31 号, 记载明确无疑。

3) 《北京中医》杂志社地址的变迁。1951 年也在“北京内一区八面槽 23 号”, 可能与北京中医学会在同一地点办公; 1953 年至 1954 年 12 月在“北京前外打磨厂一八六号”, 1953 年第 8 期“北京中医月刊稿约”第 12 条“来稿请寄北京打磨厂一八六号北京中医月刊社”; 1955 年改成《中医杂志》后, 地址变成“北京西四北大街 31 号”, 与北京中医学会地址相同。

4) 北京中医学会针灸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委员是朱璉。在《北京中医》第一卷第二期《“针灸疗法”与坐骨神经痛》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医学会前天成立个针灸委员会, 有北京针灸名家, 医师, 来宾首长, 借(东单)三条医联开的成立大会, 好热闹, 你所推许的那位朱璉局长, 我们大家已经推举为主任委员”, 由此推断朱璉为第一任主任委员。笔者还从网络上查到《人民日报》

1979 年 5 月 24 日第 3 版由董必武夫人何连芝写的《毛泽东勉励朱璉医生：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要出国》的文章，部分摘录如下：

朱璉同志是我们党内最早响应毛主席关于西医学习中医号召的一个女医务工作者，也是我们党内最早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近代科学知识，研究祖国医学宝贵遗产针灸疗法卓有成效的一位女大夫。当时，她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和华北卫生学校的领导工作。董老是华北人民政府的领导干部之一，朱璉同志经常关心董老的身体健康。全国解放以后，董老生病时还常请她来进行针灸治疗。

董老早就认为针灸疗法有许多优点：工具简单、疗效好、不用药、花钱不多、方便易行，应当大力推广。1948 年，在华北人民政府时，董老就支持朱璉同志搞中西医结合的平山医疗实验区；新中国成立之初，董老又大力支持朱璉同志在北京创办第一个针灸研究所（应是指北京中医学会针灸委员会成立并任第一任主任之事）。

董老还热心地为朱璉同志所著《新针灸学》第一版撰写了序言。另据网络报道，《新针灸学》的出版，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广泛重视。朝鲜、越南、苏联等国，分别译成本国文字出版。1954 年修改的《新针灸学》再版后，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便宴上，举杯祝贺针灸万岁，并对朱璉说“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要出国，将来全世界人民都要用它治病”。

5) 中医研究院的成立时间。在 1956 年第 1 期杂志的封底有一幅照片，在下面的照片说明是：“中医研究院已经在本月十九日（应指 1955 年 12 月 19 日——编者注）宣告成立，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今后我国医学界将会在他的统一指导下有组织地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封三上有 6 幅照片，在照片说明中说：“中医研究院从全国各地聘来三十多位著名中医已经正式参加中医研究院工作”，设有内科研究所、外科研究所、中药研究所、针灸研究所、图书馆和“附属医院在北京西郊风景区，暂设一百张床位”，这里说的附属医院应该是现在的西苑医院。

3 收藏的最高境界是安置好藏品

人生百年，藏品到了藏者的身边，实际上是让他好好保管几十年，然后终究还是要交出去的，所以收藏的境界不是为了占有，而是努力把藏品放到一个最佳的位置上。

我们所收藏的这些杂志作为纸张放在自己家

里，其实是时时不放心的，纸张易老，家中毕竟温度湿度等均不是最佳，原本想闲暇时细细研究诸位医家的经验，考证当时的历史细节……不想人到中年，事务缠身，总是不能心静，这些藏品一放就是 6 年过去了。想到收藏这些杂志是因为同学说中医杂志社缺少早期杂志实物，当初就有送她们回家的想法。只是当年影影绰绰的人和物，小心翻看相关内容时，得以了解了详情，存着研究、考据的想法，所以拖到现在。

《中医杂志》是我们中医界学术声誉最高的杂志，在我们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都受到过《中医杂志》的影响帮助，我的最初的几篇论文也是在《中医杂志》发表的。所以，“让藏品回家”是安置这些杂志的最好选择。2015 年 8 月，我们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举办了毕业 30 年同学聚会，我在这个时候和同学们表示了要把这些杂志捐献给中医杂志社的想法，获得了同学们的一致赞成。

想到很快要与这些杂志分离了，以后再翻看的机会几乎是没有了，且从收藏的角度讲，对纸质藏品也是不能过多翻看的，思考再三，还是决心拍照留下记录，一是我现在没有时间，只能留待以后有时间再去研究，二是很多的历史信息都是在封底、封面和一些页面之间保留着，所以我最终还是决定先拍照保存，拍照完成后一定要让藏品带着这些照片回家。

在拍照进行期间，中国中医科学院迎来了成立 60 周年的庆祝，也适逢《中医杂志》创刊 60 周年，更喜闻屠呦呦研究员因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这是中国第一个科学诺奖，而屠呦呦研究员是第 17 位获科学奖的女科学家，这一切皆是来源于盛世中医。我也希望通过这些留存的杂志照片，能让一些历史细节得以保留。

送走了这些宝贝，我是完全放下了负担，一身轻松，只剩满心欢喜。

4 收藏中医

说到收藏，我一生中最成功的收藏是收藏了中医。50 年前，我听到了一个伟大的预言“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要出国，将来全世界人民都要用它治病”；35 年前，我加入其中并成为终生的职业；现在，我看到了这个预言的实现并凭借我所学的针灸环游了地球。收藏中医，得之于祖祖辈辈的流传，还将会传之于子子孙孙，广播于全世界。

这是任何一个收藏者所能经历的最成功、最美丽的收藏过程了！

编辑：柴倩云